

江苏丹徒大港母子墩西周铜器墓发掘简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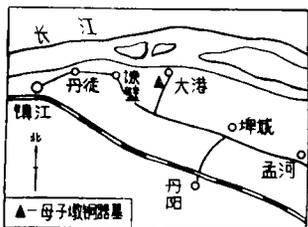
镇江博物馆 丹徒县文管会

1982年9月，丹徒县大港公社赵庄大队采石场工人在乔木山上的母子墩取土时发现一件青铜簋，随后送交镇江博物馆。博物馆当即派员会同丹徒县文管会，对母子墩作了发掘清理。经发掘证实是一座大型土墩墓，出土一批珍贵青铜器，另外还有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器。

母子墩位于大港镇南乔木山的山脊上，东距1954年发现的烟墩山宜侯矢墓^①和1982年3月发掘的磨盘墩西周墓^②约3公里。这里是地处长江之滨的丘陵坡地，除紧依江边的圈山较高外，其它如青龙山、乔木山、烟墩山等，皆不过高三、四十米。在这些丘陵山脊上分布着一些商周时期台形遗址以及大型土墩墓，母子墩就是其中之一（图一）。现将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一 墓葬形制

母子墩为一座人工堆筑土墩，外观呈馒头形，现存底径30余米，高出地表5米许。内有一个墓葬，形制与过去发掘的江南地区土墩墓一致，但规模较大。系先平整墓址，然后培土垫填60厘米高的墓基，上再用长、



图一 母子墩铜器墓位置示意图

宽、厚大体为 $40 \times 35 \times 30$ 厘米的不规则石块，砌一长6.1、宽3.2米东西向长方形的墓底边框，中间铺垫一层草木灰，厚3厘米，以防潮湿。根据随葬器物底部残存的席子痕迹，得知在草木灰上面还铺有席子等衬垫物。尸体置于衬垫物之上，位于墓底中部，保存极差，仅残存一些骨渣和一段长7厘米的肢骨。不见使用棺槨之类的葬具。随葬器物分布有序，按不同类别成组陈放在尸体四周（图二）。最后封土掩埋，堆筑墓墩。整个墓墩封土纯净，未经夯打。其断面地层由表及里土质土色明显分为四层：

表土层：黄灰色耕土，厚35厘米。

第二层：红棕色粘土，厚280厘米，中间局部夹有石砂层。

第三层：黄褐土，比较松软，厚140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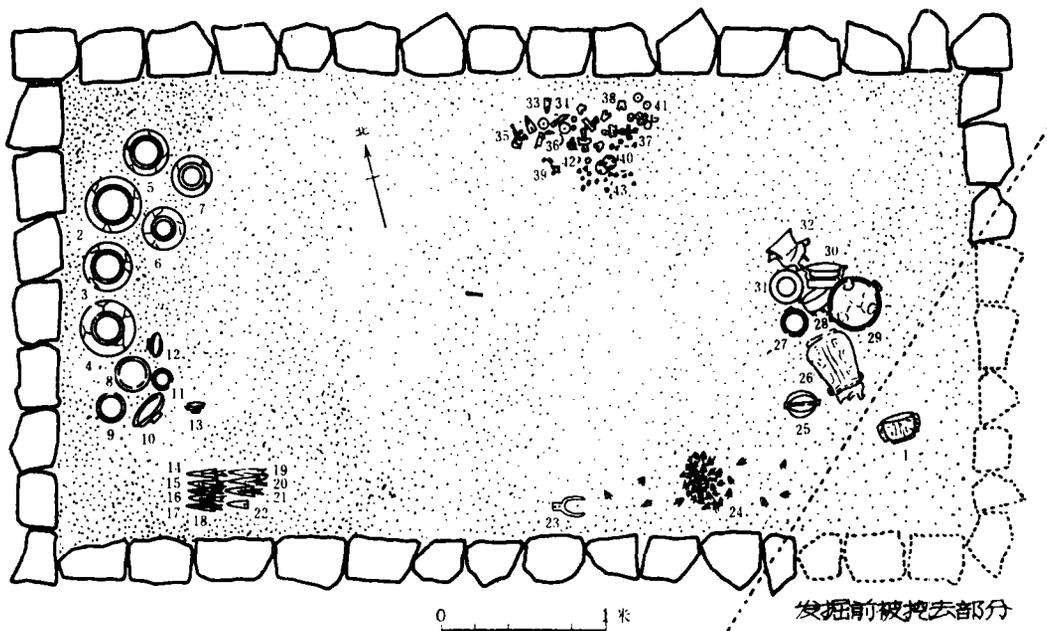
第四层：即墓基填土，为黄色砂性土，厚60厘米。以下便是山岩（图三）。

二 随葬器物

母子墩墓的随葬器物以青铜器为主，包括铜礼器、兵器及车马器；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为辅，不见泥质陶器。各种器物介绍如下：

一、青铜礼器，共九件。有鼎、鬲、簋、尊、卣、壶等器种。

雷纹鼎一件。敛口，折沿方唇，直耳，耳内面饰一道凹纹。腹下部外鼓，柱足。口沿下饰弦纹框边的带状方雷纹一周，由三道凸竖粗线间隔成三组。自口沿至足留



图二 墓底平面和随葬器物分布图

1. 双兽首耳簋 2. 几何印纹硬陶坛 3、4. 几何印纹硬陶罐 5—7. 原始瓷罐 8—13. 原始瓷豆 14—21. 铜矛 22. 铜镞 23. 铜钺 24. 铜镞 (一百二十余件) 25. 提梁卤 26. 飞鸟盖双耳壶 27. 雷纹鼎 28. 云形鸟纹鼎 29. 雷纹鬲 30. 双鸟耳方座簋 31. 铜尊 32. 鸳鸯形尊 33. 盥 (二件) 34. 辖 (二件) 35. 铜挂钩 (二件) 36. 铜垫圈 (四件) 37. 马衔、镞 (二副四件) 38. 节约 (四件) 39. 兽首饰 (二件) 40. 特大铜泡 (二件) 41. 大铜泡 (八件) 42. 中铜泡 (二十八件) 43. 小铜泡 (四百余件)

有凸起的三范铸痕，底部也留有三角形合范铸线。底、足满被烟炱，器内底积有一层油垢。通高21.2、口径17.8、腹深10厘米，重1.95公斤（图四：1；五：1；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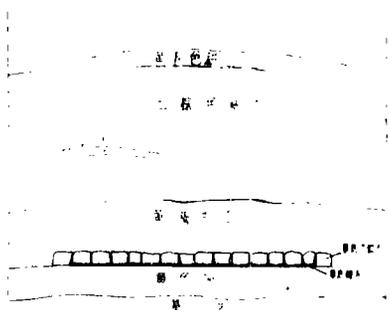
云形鸟纹鼎 一件。器形基本与雷纹鼎相同。竖耳外撇，耳外面二道凹纹，一耳和一足相对。口沿下饰一周宽线条组成的云形变体鸟纹，并附饰三个“卩”形纹作为间隔。器壁单薄，质地松脆，出土时已被压破变形。经修复通高25.3、口径20.2、腹深12厘米，重2.1公斤（图版貳：2；图四：2；五：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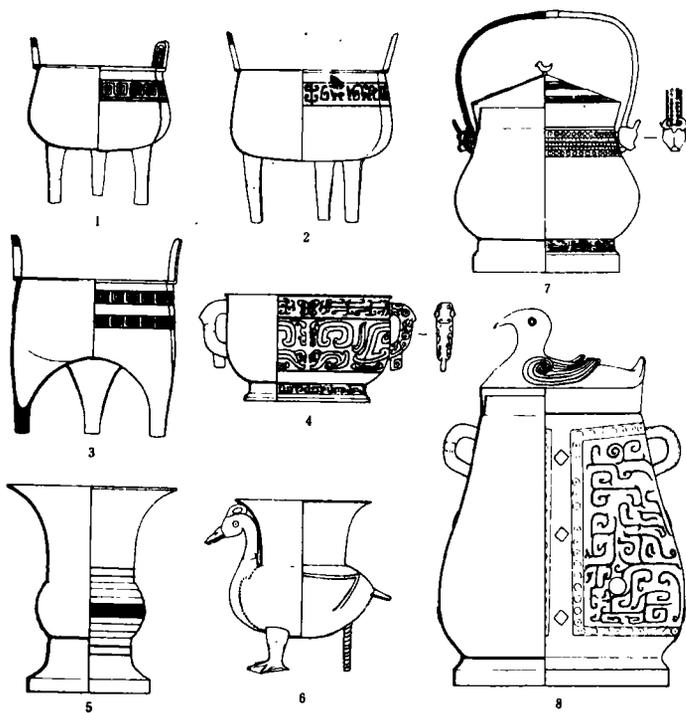
雷纹鬲 一件。直口，平折沿，竖耳，腹壁竖直，高弧裆，锥形袋足，柱状实足根。耳内面二道凹纹，口沿下饰条带状方雷纹两周，由三“丿”形纹间隔成三组。器大凝重，铸造较粗，器面带有许多砂眼，器表未经修磨。铸痕犹存，在一足的上部空心处

有一大块修补斑痕。裆、足部满积烟炱。通高39.5、口径32、腹深15.3厘米，重7公斤（图版貳：3；图四：3；五：3）。

双兽首耳簋 一件。直口，深腹，卷沿，圈足，双兽首耳下垂小珥。口沿下饰几何形勾连纹，中间并附饰蝶形浮雕牺首；腹部饕餮纹；圈足几何形勾连纹。高14、口径22.2、腹深11.5厘米，重3.15公斤（图版壹：3；图四：4；九）。

图三 墓墩封土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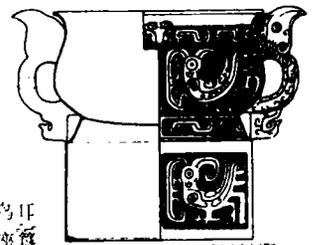


图四 青铜礼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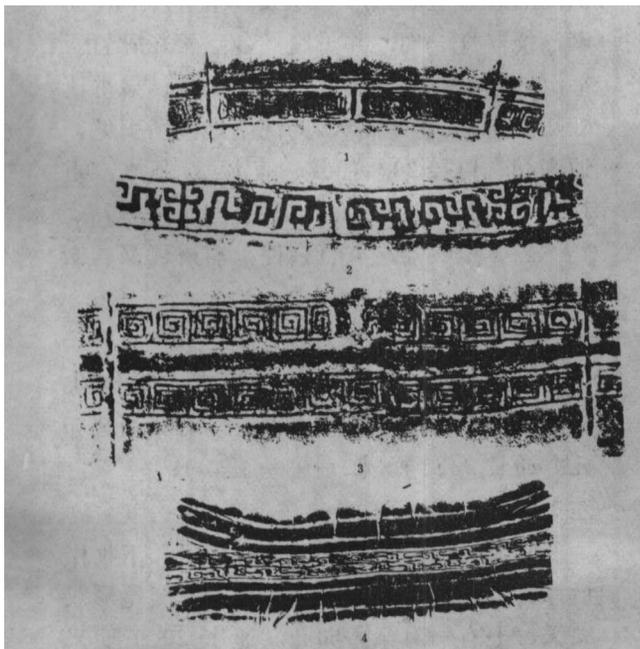
- 1.雷纹鼎 2.云形鸟纹鼎 3.雷纹鬲 4.双兽首耳簋 5.尊
6.鸳鸯形尊 7.提梁卣 8.飞鸟盖双耳壶(3为1/15,余为1/10)



图六 双鸟耳方座簋铭文拓片(原大)



图七 双鸟耳方座簋



图五 铜器纹饰拓片(1/5)

- 1.雷纹鼎腹部纹饰 2.云形鸟纹鼎腹部纹饰
3.雷纹鬲腹部纹饰 4.尊腹部之云形勾连纹



图八 双鸟耳方座簋纹饰拓片(1/5)

- 1.颈部蚕纹和腹部凤鸟纹
2.鸟耳纹
3.圈足部蚕纹
4.方座顶面四角饕餮纹
5.方座凤鸟纹
6.圈足底面方格铸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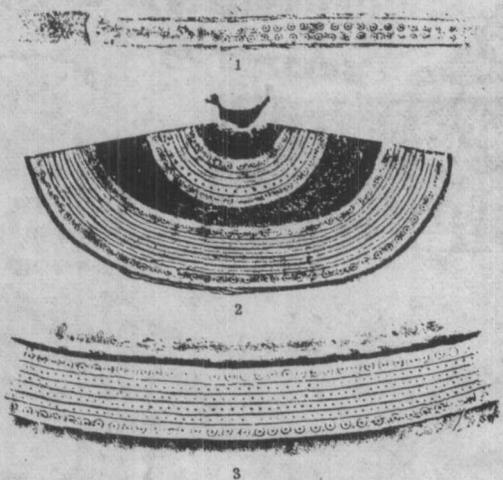
双鸟耳方座簋 一件。敞口，方唇，束颈，鼓腹，圈足，方座。两耳作鸞鸟形，下有卷尾小珥，造型奇特。口沿下饰蚕纹，中间并附饰浮雕牺首；腹部及方座的主体纹饰皆为细云纹衬地的两对特大凤鸟；圈足蚕纹；方座四角顶面作饕餮纹。纹饰雕刻繁密细致，端庄富丽。器壁很薄，最薄处仅1毫米左右，铸造精工，在圈足底面带有方格铸纹。器内底部铭文五字：“白(伯)乍(作)寶罍(尊)彝”(图六)。这是在江南首次发现的方座簋。通高24、口径22.2、腹深12厘米，重4.7公斤(图版貳：1；图七、八)。

尊 一件。喇叭形侈口，圆鼓腹，高圈足外侈，有直裙。腹部铸六道凹纹，中间饰一条带状云形勾连纹，腹上下各有二道凸弦纹。高27、口径22.2、腹深18.5厘米，重3.35公斤(图版壹：2；图四：5；五：4)。



图九 双兽首耳簋纹饰拓片(1/6)

1. 颈部几何形勾连纹和腹部饕餮纹 2. 耳部兽纹
3. 圈足部几何形勾连纹



图一〇 提梁卣纹饰拓片(1/4)

1. 提梁纹饰 2. 盖顶面纹饰 3. 颈部纹饰

鸳鸯形尊 一件。喇叭形侈口，下部器体为鸳鸯的造型，长颈昂首，束翅展尾，臀部下垂一螺旋形的支柱，连同带蹼双脚，构成器物三足。整个器形比例匀称，挺拔稳重，鸳鸯形态逼真，栩栩如生，周身素朴无纹，清秀简美，堪为了一件精美的青铜艺术佳作。通高22.2、口径18.3、腹深17厘米，重3.05公斤(彩色插页；图四：6)。

提梁卣 一件。平面椭圆形。有盖，盖钮作小鸟形。扁提梁，两端为牛头形兽首，鼓腹，圈足。颈部及盖顶面纹饰都是圈点纹镶边的平行细绳纹相间圆点纹，圈足饰斜三角云纹，提梁上两行圈点纹。带梁通高34.5、口径17.7×13.5、腹深16.2厘米，重4.6公斤(图版壹：1；图四：7；一〇)。

飞鸟盖双耳壶 一件。壶体平面为圆角长方形，直口斜颈，鸱鸟形盖，仰首展翅翘尾呈飞翔姿态，腹微鼓，圈足有裙，颈上两对称竖耳。壶体正面和两侧居中为条状凸带纹，上附加方钉纹，正面三颗，侧面二颗；由圈点纹镶边的云形勾连纹，组成四组图案，绕器身一周，并于腹部各点缀一乳钉。每组的图案花纹形态并不完全一致，显得比较随意自如。器体高大，为江南地区所少见。通高49、口径20×13.8、腹深34厘米，重14.4公斤(彩色插页；图四：8；一一)。

二、铜兵器，共百余件，有矛、叉、镞和箭镞等。

矛 八件，可分为四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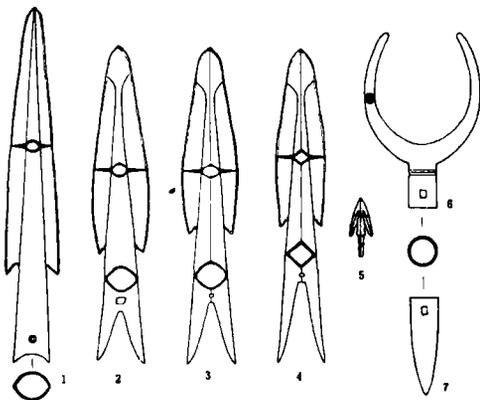
I式二件。叶窄长，刃较直，后锋尖锐，圆凸脊，椭圆形骹，上有一对穿的圆卯孔。通长23.3厘米(图一二：1；一三：左1)。

II式二件。叶中部向外成弧形，下收作后锋。圆凸脊，菱形骹，骹口端呈燕尾形双尖叉，上有一对穿方卯孔。通长20.9厘米(图一二：2；一三：左2)。

III式三件。形制同II式，但叶较短，骹口端两叉较长，有明显棱脊线。通长20.7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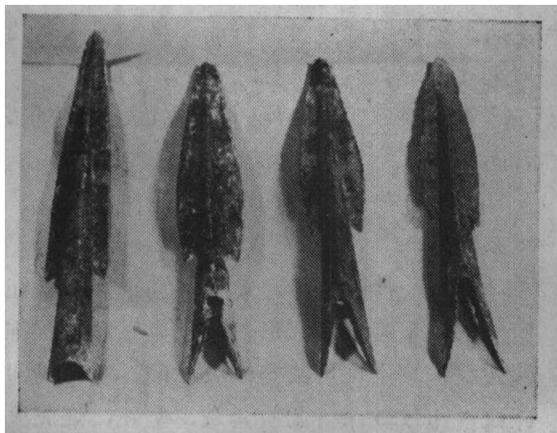


图一— 飞鸟盖双耳壶腹部纹饰拓片 (1/12)



图一二 铜兵器

1—4. 矛 (I—IV式) 5. 铜镞 6. 铜叉
7. 铜镞 (6,7为1/10, 余为1/5)



图一三 矛 (左起: I—IV式)

米 (图一二: 3; 一三: 左3)。

IV式一件。与II、III式矛相似, 但叶最短, 戟口双叉最长, 中脊及散作菱形。通长20.6厘米 (图一二: 4; 一三: 左4)。

第 5 期

叉 一件。作双股式, 向内弯曲, 叉尖圆秃无锋。骹上饰二道凹弦纹, 近口一对穿的长方卯孔。通长22.8、骹口径3.6厘米 (图一二: 6; 一四)。此叉形器过去未曾见过, 用处不明, 根据它在墓中和铜矛放在一起, 可能是兵器。



图一四 叉和镞

镞 一件。镞长圆锥形, 口径同叉, 长12.8厘米 (图一二: 7; 一四)。从铜叉与镞出土位置相对成一直线的情况来看, 它们本应是装有木柄的完整器件, 柄已腐烂无存, 长约1.83米。

镞 共出土一百二十余件。均为三锋两刃, 有铤, 中起脊。长3.8—4.3厘米 (图一二: 5; 一五)。

三、铜车马器, 包括舌、辖、衔、镡以及挂钩、节约、铜泡等, 总计达数百件, 这些车马器出土时皆堆放一起, 作为墓主车马的象征。

舌 二件。直筒锥形, 锥端部饰螺旋纹和折线纹。对穿的长方形辖孔2.4×1厘米。舌长8.6、口径4厘米 (图一六: 1; 一七: 1; 一八: 1)。

辖 二件。扁条体, 辖首有勾状饰和一方形孔。辖一件通长8.6、一件9.5厘米, 下



图一五 辖

部销孔均为 2×0.5 厘米（图一六：2；一八：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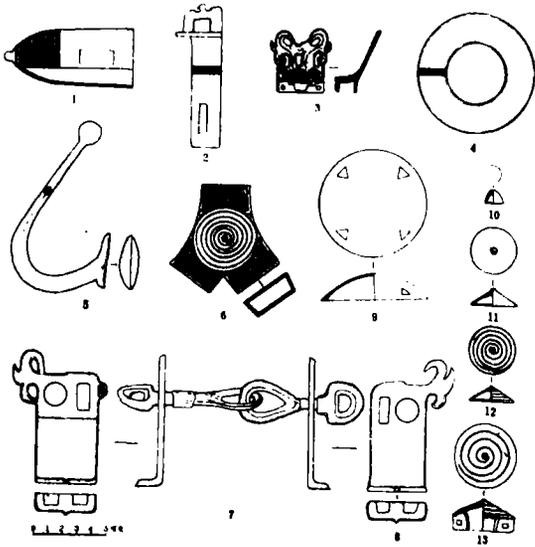
垫圈 四件。作璧形。其中二件稍大，外径8、内径4.3、厚0.5厘米；另二件略小，外径7、内径4.1、厚0.3厘米（图一六：4；一八：5）。

挂钩 二件。形似现代挂衣钩，一端有脚，高12厘米（图一六：5；一八：3）。此挂钩和《浚县辛村》M3、M25各出土的一对帷钩一样，为“揭挂车前面帷幔之用的”。

兽首饰 二件。作长方形兽面铺首，底边有两竖立梁，梁上三对穿方孔。高4、宽3.2厘米（图一六：3；一七：3；一八：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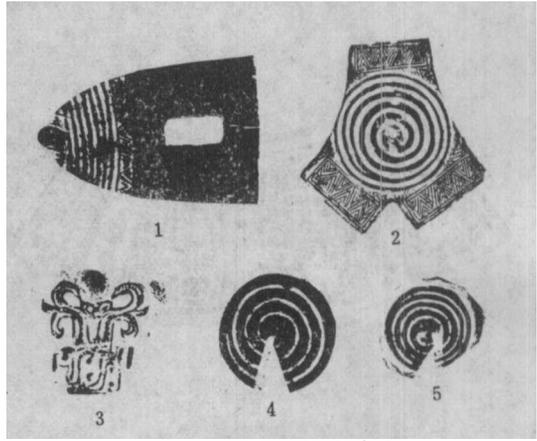
衔、镡 二副（四件）。衔作两节互相联结的“8”字形，两头装长方形的镡，一端折边，有二方孔，一端附加饰钮。衔通长17厘米，镡长7.5、宽4厘米（图一六：7、8；一八：4）。

节约 四件。呈人字形，三通。正面中心凸出一乳尖周环绕螺旋纹，三支部饰折线纹。通长7.5、肢宽3.5厘米（图一六：6；一七：2；一八：6）。



图一六 车马器

1. 舌 2. 辖 3. 兽首饰 4. 垫圈 5. 挂钩
6. 节约 7. 衔 8. 镡 9. 特大铜泡 10. 小甲泡
11、12. 中铜泡 13. 大铜泡



图一七 车马器纹饰拓片（1/3）

1. 舌 2. 节约 3. 兽首饰 4. 大铜泡 5. 中铜泡

特大铜泡 二件。正面圆鼓，靠边四个对称的三角形穿系孔，径7.4厘米（图一六：9；一八：7）。其形制与安阳殷代车马坑中发现饰于马的眉心间的特大铜泡相似^⑨。

铜泡 出土最多。均属马络头饰件，又分大、中、小三种：

大铜泡 八件。正面起凸，中心一乳尖周环饰螺旋纹，背面四个“L”形带孔鼻梁，构成十字交叉穿系革带。径4.3厘米（图一六：13；一七：4；一八：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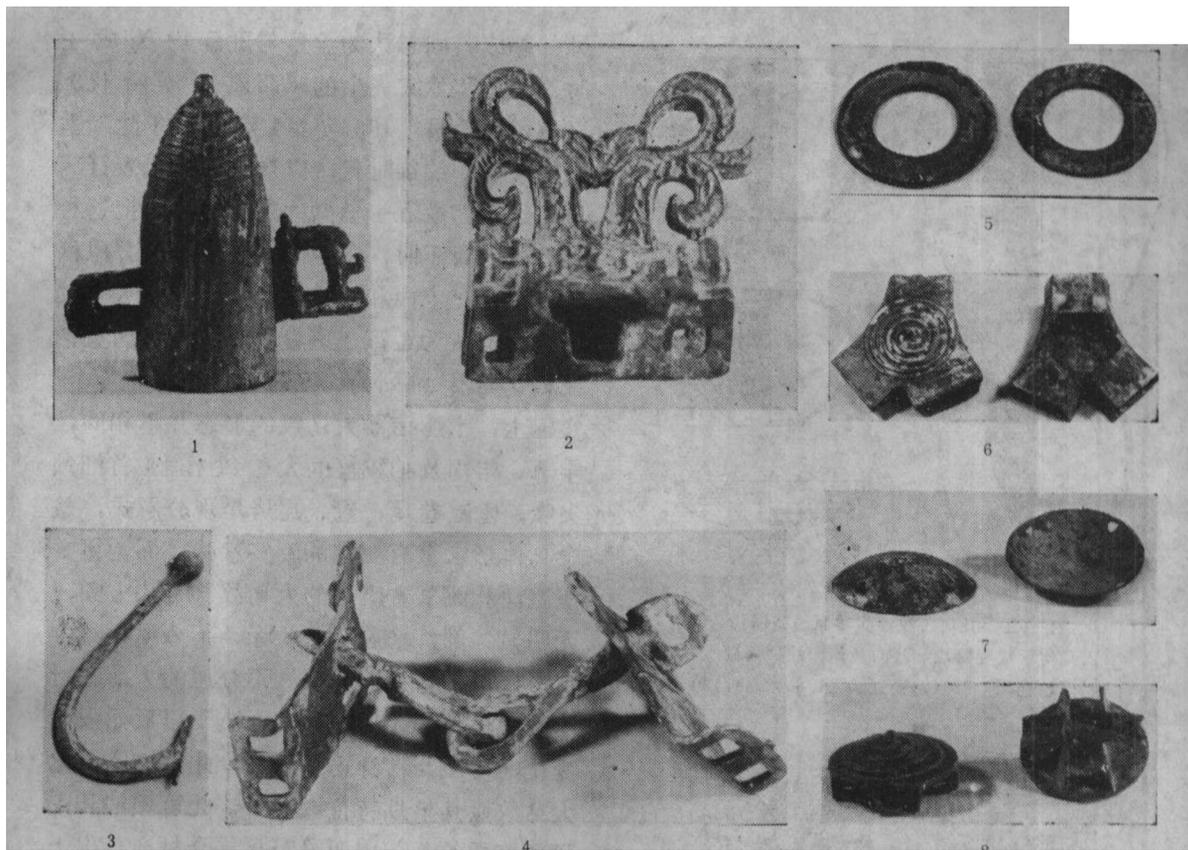
中铜泡 二十八件。正面起凸或圆鼓，多素面，少数饰螺旋纹，背面一横梁。径3.2厘米（图一六：11、12；一七：5）。

小甲泡 四百余件。正面高鼓成馒头状，背面一横梁。径1—1.3厘米（图一六：10）。

四、几何印纹硬陶器，共三件。有坛、罐两种器物。

坛 一件。翻沿，短颈，宽平肩，丰在腹上部，下略成斜弧形，内收成平底。颈饰凹弦纹，肩上饰折线与回纹相间，腹下满印回纹，印纹较深。胎质紫灰，坚硬，烧成火候高。口径24.5、高40.5厘米（图一九：1；二〇：1、2；二二）。

罐 二件。器形大体与上硬陶坛一致，纹饰相同。一件口径19.5、高28.5厘米（图一九：2；二〇：3；二三）。一件口径20、高26.5厘米（图一九：3）。



图一八 车马器

1. 辖和舌 2. 尊首饰 3. 挂钩 4. 衔、轡 5. 铜垫圈 6. 铜节约 7. 特大铜泡 8. 大铜泡

五、原始瓷器，共九件。有罐、豆两种器物。

罐 三件。形制相同，大小相次。斜折沿，圆鼓腹，最大径在腹中部，小平底。口沿饰凹弦纹，肩部饰以弦纹相间的刻划斜带状纹，腹下满印折线纹。胎质灰白致密，内外均施釉，釉色茶绿，釉层厚薄不均，遍体一道道流釉斑痕。三件罐在烧制中腹下一侧都产生倾瘪毛病。一件口径18.6、高19，一件口径18、高20.5，一件口径16.8、高21.5厘米（图一九：4；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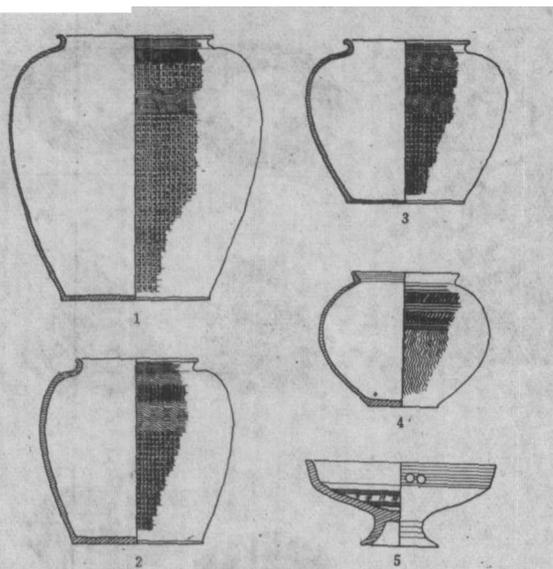
豆 六件。皆直沿微侈，浅盘，喇叭形圈足。口沿外饰弦纹，有的并粘贴成对的饼状饰，盘内细弦纹间篦齿划纹或点戳纹，圈足部弦纹。通体施釉，釉色薑黄或浅豆绿色，釉层薄而均匀，胎釉结合紧密，无脱釉和裂纹现象。可分大、中、小三型：大型豆二件，口径20.7、高8.5厘米，是目前出土原

始瓷豆中最大的一种，过去发现不多（图一九：5）。中型豆一件，口径18.2、高6.5厘米。小型豆三件，口径13.5、高4.5厘米（图二五）。

三 年代推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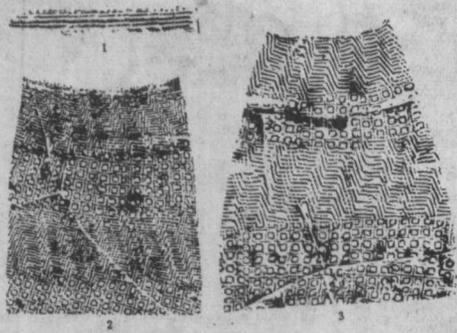
母子墩墓出土青铜器，从其冶铸工艺技术、器形纹饰特征以及铭文字体诸方面看，均呈现西周早期作风。

根据铜器上的铸痕考察，均系采用合范浑铸法。在器物两侧被耳遮避打磨不到处，以及有的器腹和圈足部位均见有合范铸缝。如鼎、鬲的范痕通体未经修磨，铸缝明显，棱角槎枒，三壁范铸缝与三足对应，底范三角形。有些带附件器物，如卣的提梁、簋的双耳等，均是先铸好附件后，再与器物主体铸为一体。这种方法，为我国青铜冶铸上的早期铸造技术。



图一九 几何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

- 1.几何印纹硬陶坛 2、3.几何印纹硬陶罐
4.原始瓷罐 5.原始瓷豆(5为1/8,余为1/12)



图二〇 几何印纹硬陶器纹饰拓片(1/5)

- 1、2.硬陶坛颈部旋纹、肩腹部折线纹、回纹
3.硬陶罐腹部折线纹、回纹

此墓云形鸟纹鼎的一耳和一足相对，是殷代鼎的遗风；两件竖耳垂腹柱足鼎，与属于西周早期的烟墩山宜侯矢墓、溧水乌山一号墓铜鼎形制相同^①，它们的作器年代当在西周早期偏晚。铜鬲的直耳、瘡状高弧裆和锥形袋足形式，也与烟墩山宜侯墓铜鬲是一致的^②，但其口腹壁竖直比较特殊。双兽首耳簋与岐山贺家村出土的史踬簋相似，史踬簋为康王时器^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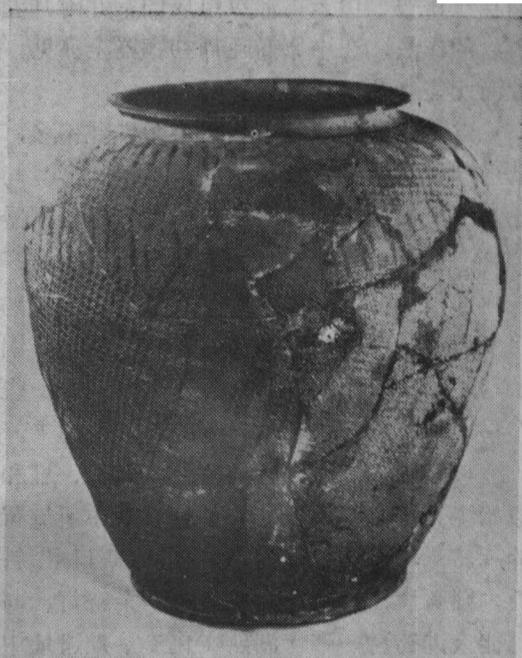
此墓的一件带铭方座簋，器形及腹、座所饰大凤鸟纹，与长安张家坡西周铜器群之孟簋完全相同，唯此簋双耳作鹭鸟形甚是罕

见。郭沫若同志认为孟簋与班簋均为成王时器^④。陈梦家先生的《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将此“垂喙的大鸟”纹饰时代，以庚嬴卣为代表订为康王之世。最近李学勤同志提出：“把这种鸟纹列入康王时，未免失之过早。”并以穆王时丰尊、丰卣和伯彘簋等器的相对大鸟纹证之，他认为孟簋、班簋同丰尊、丰卣及伯彘簋这类器“都列为穆王时，是正确的”^⑤。实际上，上述诸器大鸟纹的形态并不相同，丰尊、丰卣及伯彘簋的大鸟纹作圆首细颈尖喙，垂冠卷尾，冠、尾皆呈现分解式，整个鸟体形象带有一定的写实意味。而孟簋、庚嬴卣和此墓方座簋的大鸟纹却是头方圆，无明显颈部，垂冠卷曲长喙，不分尾，整个鸟形显得比较古拙抽象。不分尾的大鸟盛行于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至康王以后始发生变化，鸟尾与鸟身逐渐分离。此墓方座簋之大鸟纹显具早期特征。同时，此簋颈部和圈足所饰蚕纹，与山西灵石县旌介村商墓出土铜觚^⑥、长安普渡村二号墓铜簋^⑦和甘肃灵台姚家河墓铜簋上的蚕纹相同^⑧，见于商代和周初。另外，此簋铭文简约，字体端正，带有“画中肥而首尾出锋”的西周早期铭文风格。因此，此簋年代不会晚于康王时期。

铜尊和过去仪征破山口发现的西周铜器群中的“蟠虺纹尊”（其实不是蟠虺纹，而是江南常见的一种云形勾连纹饰）如出一模^⑨，是商晚周初流行的三段式筒状尊的形制，酷肖传世耳尊^⑩及河南襄县西周墓出土的铜尊^⑪，属成、康时器。鸳鸯形尊，与辽宁喀左县马厂沟出土的西周早期“匱侯”铜器中的一件鸭形尊有些类似^⑫，其年代亦应大体相当。提梁卣与当地溧水乌山二号墓出土卣相同^⑬，近于宝鸡茹家庄M1乙：3卣卣^⑭和扶风云塘13号墓卣卣的形制^⑮，年代约为康王时期。此墓一件飞鸟盖双耳壶，器形、装饰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但壶体下腹微鼓倾垂，是康、昭时期铜器的特点；纹饰上的



图二一 雷纹鼎



图二二 几何印纹硬陶坛



图二三 几何印纹硬陶罐



图二四 原始瓷罐



图二五
原始瓷豆

圈点纹镶边、由云雷形纹组成图案并附加乳钉纹的作法，在中原商晚周初铜器上亦见，故而此壶当为西周早期作品。

以往西周时期的铜兵器中矛发现不多，其形制较商代铜矛叶较窄长，呈柳叶形。与此墓出土铜矛相同者亦见于仪征破山口铜器群^⑩，双叉式釜为其鲜明的地方特点，而窄长叶部带后锋的形制，则与北京房山县琉璃河发现的成康时期52号墓铜矛相一致^⑪。铜镞与中原殷末周初铜箭头没什么区别。一些车马器件，与宜侯矢墓出土的基本一样^⑫。

母子墩墓出土的几何印纹硬陶坛、罐和原始瓷豆都是江南地区一期土墩墓中所流行的^⑬。三件原始瓷罐尚不多见，其口沿斜折，圆弧腹，底甚小，整体象一个宫灯，与丹徒大港葛村一带“湖熟文化”早期遗址中所见的一种折沿、圆腹、小底的印纹陶罐形态异常接近^⑭，器形上明显呈现出是一脉相承的。此类型原始瓷罐在屯溪一号墓也曾有出土^⑮，但腹部变得更加突鼓，底增大，较母子墩墓原始瓷罐时间显然要晚。

综合上述对母子墩墓各类随葬器物年代的推断，可看出它们皆为西周较早期的东西，时代是比较一致的。因而此墓的时代，按目前对江南土墩墓的一般分期断代，应属西周前期，具体说约西周早期偏晚或中期之初，与康王时的烟墩山宜侯矢墓接近。

执笔：肖梦龙

绘图、拓片：肖梦龙 杨志贵

照相：孙志江 史宝珍

①⑥⑩ 江苏省文管会：《江苏丹徒县烟墩山出土古代青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江苏文管会：《江苏丹徒烟墩山西周墓及附葬坑出土的小器物补充材料》，《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期。

- ② 《丹徒磨盘墩遗址发现一座西周墓葬》，《新华日报》1982年11月11日第1版。
- ③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新发现的殷代车马坑》，《考古》1972年第4期。
- ④ 镇江市博物馆、溧水县文化馆 刘兴 吴大林：《江苏溧水发现西周墓》，《考古》1976年第4期。
- ⑤ 长水：《岐山贺家村出土的西周铜器》，《文物》1972年第6期。
- ⑦ 《长安张家坡西周铜器群》，文物出版社，1965年3月。
- ⑧ 李学勤：《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周原庄白、强家两处青铜器窖藏的综合研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
- ⑨ 戴尊德：《山西灵石县旌介村商代墓和青铜器》，《文物资料丛刊》第三辑，1980年。
- ⑩ 石兴邦：《长安普渡村西周墓葬发掘记》，《考古学报》第八册，1954年。
- ⑪ 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灵台县文化馆：《甘肃灵台县两周墓葬》，《考古》1976年第1期。
- ⑫ 王志敏、韩益文：《介绍江苏仪征过去发现的几件西周青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2期。
- ⑬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三）·44器，《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
- ⑭ 河南省博物馆：《河南省襄县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8期。
- ⑮ 热河省博物馆筹备组：《热河凌源县海岛营子村发现的古代青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8期。
- ⑯ 镇江市博物馆、溧水县文化馆：《江苏溧水乌山西周二号墓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二辑，1978年。
- ⑰ 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发掘队：《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西周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4期。
- ⑱ 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云塘西周墓》，《文物》1980年第4期。
- ⑲ 尹焕章：《仪征破山口探掘出土铜器记略》，《文物》1960年第4期。
- ⑳ 琉璃河考古工作队：《北京附近发现的西周奴隶殉葬墓》，《考古》1974年第5期。
- ㉑ 邹厚本：《江苏南部土墩墓》，《文物资料丛刊》第六辑，1982年。
- ㉒ 南京博物院：《江苏丹徒葛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记》，图版贰，7，《考古通讯》1957年第5期。
- ㉓ 安徽省文化局文物队：《安徽屯溪西周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4期。



鸳鸯形尊 西周 江苏丹徒出土

通高22.2、口径18.3、腹深17厘米，重3.05公斤



飞鸟盖双耳壶 西周 江苏丹徒出土

通高49、口径20×13.8、腹深34厘米，重14.4公斤



1 提梁卣



2 尊



3 双兽首耳簋



1
双鸟耳方座簋



2 云形鸟纹鼎



3 雷纹鬲